



蒙古的 历史与文化

蒙古学论集

二木博史 著

呼斯勒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的 历史与文化

蒙古学论集

——

——

——

K911.07

K311.07
1

蒙古的历史与文化

——蒙古学论集

二木博史 著

呼斯勒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的历史与文化/(日)二本博史著;呼斯勒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10

ISBN 7-204-07017-8

I. 蒙… II. ①二… ②呼… III. ①文化史-研究-蒙古
-20世纪 ②蒙古-历史-研究-20世纪 IV. K31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7642 号

蒙古的历史与文化

——蒙古学论集

[日]二本博史 著

呼斯勒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875 字数:340千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204-07017-8/K·443 定价:38.00元

目 录

序.....	(1)
--------	-----

第一编 中世纪蒙古的法律与社会制度

关于白桦法典.....	(6)
《喀尔喀·济鲁姆》的形成过程.....	(45)
和硕内平民的贡租和赋役负担——以清代喀尔喀蒙古 为例	(62)
论清代喀尔喀蒙古的奴隶解放文书	(81)

第二编 20 世纪上半叶蒙古民族史

“大蒙古国”临时政府之成立.....	(104)
蒙古人民党成立史的再探讨——以《都克索穆的回忆》 为中心.....	(130)
仁钦诺与蒙古革命.....	(156)
对《蒙古真理》报内容的再探讨.....	(175)
蒙古人民党第 1 次代表大会与布里亚特革命家.....	(201)

丹巴道尔吉政权对内蒙古革命的援助·····	(218)
丹巴道尔吉政权的败北·····	(237)
迪鲁瓦·呼图克图的回忆录·····	(261)

第三编 蒙古的文化与社会

蒙古的神话传说·····	(270)
梅力更·格根所作的白老翁星献香经·····	(291)
新发现的蒙古文学家额尔德木特古斯的作品·····	(316)
玛尔藏·锡拉布的世界·····	(331)
复活了的成吉思汗——对其评价的历史·····	(339)

第四编 日蒙关系史

流传在蒙古的《铁道歌》·····	(350)
日军的对蒙工作——诺门罕战争的真相·····	(359)
东京外国语大学蒙古学科的诞生与发展·····	(370)
参考文献·····	(383)
译者后记·····	(411)

Contents

Preface	(1)
----------------------	-----

I The Medieval Mongolian Law and Social Structure

A Study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Juridical Documents of Khalkha – Mongolia	(6)
On the Problem of Codification of the Qalq – a Jirum	(45)
Commoner's Tributes and Corvées in Khoshuus — in the Case of Khalkha Mongolia during the Ch'ing Era	(62)
On the Documents for Liberating Slaves in Khalkha Mongolia during the Ch'ing Era	(81)

II A History of the Mongol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 the Pan – Mongol Provisional Government Was Established	(104)
A Re – examin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Party — Centering on Dogsom's Memoirs	(130)
Rinchino and the Mongolian Revolution	(156)
A Re – examin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the Newspaper Monggol – un Unen	(175)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Party and Buryat Revolutionaries	(201)
Dambadorji's Support for Inner Mongolian Revolutionary Move – ments	(218)
Defeat of Dambadorji	(237)
Diluv Khutagt's Memoirs	(261)

III Mongolian Culture and Society

Mongolian Myths and Legends	(270)
A Prayer for Incense – Offering to the White Old Man Composed by Mergen Gegen	(291)
Newly Discovered Works Written by the Mongolian Writer. Erdemtegus during the Manchukuo Era	(316)
The World of Marzan Sharav	(331)
Revival of Chingis Khan — a History of His Estimation ...	(339)

IV A Histor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Mongolia

How the Japanese Song "Railroad March" Reached Mongolia	(350)
The Japanese Army's Operation in Mongolia — Truth of the Nomonhan Incident	(359)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ngolian Department of the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370)
Bibliography	(383)
Translator's postscript	(411)

序

本书是从笔者在过去 20 年间用日语发表的论文中选取 20 篇翻译汇集而成。2002 年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出版的论文集(由 Interpress 公司出版)基本上收录了笔者用外语(蒙古语、英语、俄语)所发表的各种论文,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可以说是该书的姊妹篇。

笔者从 1970 年起开始学习蒙古语,1974 年大学毕业时,以用托忒蒙文书写的卫拉特咱雅班第达的传记为主要资料,撰写了毕业论文《咱雅班第达及其时代》。因对 17 世纪蒙古史抱有极大的兴趣,所以,最初在上研究生院时曾准备以此为题撰写硕士论文,并为此一直坚持学习藏语、满语和俄语。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赴蒙古国留学这一经历使我的研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两年多的留学生活,使我得以涉猎有关蒙古史的各种资料和研究著作,特别是精心研读导师 Kh. 普尔列先生出版的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喀尔喀蒙古的法律文书《喀尔喀法典》,对我后来的研究而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79 年返回日本后,笔者以《白桦法典》为题,撰写了硕士论文。将该硕士论文的一部分修改润笔而成的一篇论文,便是收录在本论文集的《关于白桦法典》。当时,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冈田英弘教授的推荐下,该文于 1981 年得以在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学报《亚非语言文化研究》上发表。虽然,我从 1976 年起开始发表散文、随笔、书评、译著等,但作为学术论文,《关于白桦法典》则是笔者的处女作,难以忘却。顺便提及,是笔者

首次将普尔列先生称作是“新发现的喀尔喀法典”命名为“白桦法典”的,现在,该名称业已定型。

在一桥大学进行研究时(1981~1984年),即在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学习及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奖励研究员期间,合计发表了7篇论文。其中的两篇,是受当时的导师田中克彦先生的委托而撰写的,而且,稿酬不菲。本书中的《蒙古的神话传说》乃是其中之一,收录有该论文的新版《世界神话传说总解》(自由国民社,1983年),至今仍为各书店所销售。

而立之年过后,笔者来到韩国大田市,在那里生活了5年。我的本职工作是为大田实业专门大学的学生教授日语,其间,亦曾为韩国同事讲授日语。其中的一位友人曾将前述《蒙古的神话传说》翻译成韩国语在韩国的文学杂志上予以发表。

在韩国执教时期所从事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与他人合作,将在乌兰巴托出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第3卷翻译成日语,在日本予以出版。该书第3卷所叙述的是俄国革命后,蒙古国的历史发展情况,翻译、注解该书,为我后来研究蒙古国近现代史打下了基础。

1989年笔者再次返回日本,开始在母校东京外国语大学执教。这一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开始从各种角度重新审视历史。其中,20世纪一二十年代发生的诸多事件,及与其相关连的历史人物的新资料、新观点相继问世、层出不穷,对于学者们来说,可谓是好事不断。

蒙古国“民主化”后的1991年秋,受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派遣,笔者前往蒙古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讲授日语和日本文化,历时1年。1989年以前,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的蒙古国的档案机构此时业已解禁,各种文件档案可以公开查阅,这对于研究蒙古史的学者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变化。除此之外,20世纪90年代,在蒙古国社会、经济处于混乱状态的情况下,形形色色的书籍得以投放古

旧书市,其中亦不乏珍品。此时,笔者的研究之所以以蒙古近现代史为主,与新史料的发现不无关系。

1993年,是我的研究再次发生转机的一年。是年,笔者首次访问了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乌兰乌德。此后,1995年笔者再次来到内蒙古,对乌拉特地区的梅日更寺进行了调查,亲身体会到对梅日更·格根进行研究的重要性。1998年在参加由内蒙古大学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时,笔者用蒙语就梅日更·格根所作的献香经作了报告。

搜集蒙古文、藏文木刻本、手抄本,是笔者从最初赴蒙古国留学以来,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项工作。从摆放在古旧书店的经卷的数量上可以推断,在北京和喀尔喀地区的各个寺庙及在布里亚特各地曾经出版过大量的木刻版文献。至20世纪30年代为止,在蒙古国尚存在许多寺院,有不少僧侣在那里学习。无疑,可以将他们所拥有的文献划分为若干类型,内中亦不乏令人感兴趣的与民间信仰相关的经典。前述梅日更·格根所作的献香经,便是其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类型。

为参加纪念额尔别克道尔基·仁钦诺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笔者1998年第2次来到乌兰乌德。在第1次访问乌兰乌德时搜集到的由仁钦诺自己用俄语撰写的回忆录,是研究1920~1921年间蒙古史的重要资料之一,作为研究蒙古现代史的成果,笔者所撰写的受到了高度评价的有关仁钦诺的论文,仰仗的也正是这些资料。

近几年来,从中国内蒙古等地来到日本,在我手下学习的留学生每年都在增加,到目前,正在学习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进修生,合计近30名。这些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大都选择与中国蒙古人聚居区相关连的题目进行研究。在日本,以研究蒙古学为目的的留学生,从利用资料的角度而言,可以利用到收藏在日本的珍贵资料以及用日语撰写的基础性的研究著作,因此,完全有可能取

得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日本的蒙古学研究,在世界上占据着自己的地位,只是,由于绝大多数论著都是用日语撰写的,因而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评价,很少能够为外国人所借鉴。

此次,能够将笔者用日语撰写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呈献给中国读者,笔者甚感荣幸。译者呼斯勒氏,是我所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执教近10年,赴日留学之前已用中文发表过数篇论文,颇富才华,力能胜任本书的翻译工作。为了翻译本书,占去了他本应用来撰写博士论文的许多宝贵的时间,在此,对他致以由衷的感谢。

最后,谨向为出版笔者的论文集而尽心尽力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全体同仁致意。

二木博史(FUTAKI Hiroshi)

2003年5月5日,于东京

第一编

中世纪蒙古的法律 与社会制度

关于白桦法典

前 言

1970年蒙苏考古学联合考察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今蒙古国)布勒干省达西策林乡哈刺布合遗址的一个佛塔中发现了用白桦树皮书写的文书,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白桦文书”。数十件文书虽仍未整理完毕,但到目前为止,与佛典、佛教和萨满教交织在一起的各类经典、文学作品、文字表等并存的三件法律文书则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其中的二件(一册子和一断简)于1974年,一件于1976年(一断简)由Kh·普尔列博士予以出版^①。

本稿即对此“白桦法典”进行简单的介绍。笔者曾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过翻译^②。

白桦法典中的绝大部分于公元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编纂完成。和作为喀尔喀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喀尔喀·济鲁姆》^③研究中的一部最古老的法典、1709年编纂的3“和硕”大法典相比,白桦法典要比《喀尔喀·济鲁姆》早百年问世。提起1709年,就意味着喀尔喀蒙古(外蒙古)业已归顺清朝,而且,我们从《喀尔喀·济鲁姆》中也可以看到清朝立法的影子^④。而“白桦法典”则是喀尔喀尚处在独立状态下形成的法典,因而,保持着蒙古固有的法律体系风格。

白桦法典作为法律资料自身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该法典也为我们了解法典编纂时喀尔喀的历史、社会构造等提供了珍

贵的信息。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是喀尔喀蒙古史研究的空白期,对白桦法典进行研究,对于填补这一空白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白桦法典进行分析时,不仅要对上面提到的《喀尔喀·济鲁姆》,而且要对1640年编撰的《蒙古·卫拉特法典》^⑤予以关注。该法典中的绝大部分属于卫拉特(西蒙古)法规,与白桦法典等喀尔喀法律体系相比,存在着若干的差异,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其编撰期非常接近于白桦法典的形成期。而若与内蒙古之法典相比较的话,那么,包括《阿勒坦汗法典》^⑥、《旧满洲档》^⑦在内的由科尔沁土谢图汗等制定的法典则可以成为参考的对象。

Kh·普尔列博士在出版白桦法典这一资料的同时,也发表了若干有关该法典的研究见解。在《关于政治、社会经济的若干信息》这一部分,他归纳了如下各个项目,并作了简要的记述,a.“和硕”,b.鄂托克与牧地,c.集会,d.财产,e.畜牧,f.手工业,g.狩猎,h.喀尔喀统治阶级,i.官吏,j.喀尔喀人民阶级,k.白桦法典所反映的一个重要思想。在《人名、地名、年代考证》这一部分,普氏对白桦法典问世时的固有名词和年代进行了考证^⑧。特别是对有关法典的编纂者、编纂地点进行的考证具有极高的价值。

不过,我们在对普尔列氏所从事的出版和研究活动予以高度评价的同时,必须还要指出其所存在的若干不足之处。就其所出版的白桦法典资料而言,存在着下列问题。

(1)普尔列氏所出版的资料集并不是原法典的影印本,而是对原资料的重新抄写。蒙古文资料与罗马字转写之间存在着不少差异,显然,这是在重新抄写时出现了错误和脱落所致^⑨。

(2)原法典并无标识条目的数字,为了阅读时便于区分,普尔列氏加上了数字。可是,普氏对各个条目所作的区分,前后并不一致。两类法典中内容几乎相同的条项,在其中的一个法典中按照一项条款来对待,而在另一个法典中却按照两项条款予以处理^⑩。更有甚者,原本是一篇文章、一项条款,但却无故分为两项条款,致

使其内容难以让人理解^⑩。

其次,就其研究而言,亦有下列令人惋惜之处。

(1)白桦法典与《喀尔喀·济鲁姆》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普氏却未能对此予以注意,没有进行充分的比较研究。拿白桦法典与《喀尔喀·济鲁姆》进行比较对照时,可以发现普氏所出版的资料集中存在着读法的错误,以《喀尔喀·济鲁姆》为依据,其未能予以复原的部分也可以得到复原^⑪。

(2)对编纂者所进行的比较研究,虽说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存在着明显的错误^⑫。对法典 XIV 和 XVI 的编纂年代所作出的判断,也没有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该问题后面将予以详细的探讨)。

(3)依照白桦法典可以对该法典编纂时喀尔喀的社会构造进行研究,对用于表示各种身份和阶层的词汇进行分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普尔列氏对此所作的研究,并不够充分。譬如,完全无视“qayan 和 qan kümün”、“qaraču 和 isele”的不同,对 daruγ - a 也没有进行相应的记述(该问题也将后面予以探讨)。

1 白桦法典的时代

白桦法典的编纂时代(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也是喀尔喀史中存在着许多不明之处的时期。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孙达延汗的末子格埒森札得到了外喀尔喀,在他死后(1548 年),其领土被分给了 7 个儿子。这些领土被称为“和硕”(qosiyun),16 世纪中叶成立了 7 个“和硕”。格埒森札的孙子阿巴岱因领导发动了对卫拉特之战而成为了喀尔喀的最高领导者,并被西藏的达赖喇嘛授予了斡齐赖赛音汗的称号(1586~1587 年)^⑬。笔者以为,在这一时期,6 万户(tümen)之一的喀尔喀的独立倾向进一步显现了出来。阿巴岱汗将佛教引入喀尔喀,1586 年,在曾是蒙古帝国时代首都的哈刺和林建立了额尔德尼召^⑭。阿巴岱汗死后(1588 年),有关喀

尔喀的信息极少。从族谱来看,阿巴岱汗有锡布固泰·鄂齐尔图·珲台吉(Sabuyudai ölĵeyitü qung tayiji,生于1573年)和额列克·墨尔根汗(Eriyekei mergen qaγan,生于1578年)两个儿子^⑤。在《宝贝念珠》中有着这样的记录,“赛音汗[阿巴岱汗]刚刚去世,卫拉特人捉拿并杀死了肖宝岱汗[=锡布固泰·鄂齐尔图],进行了反叛”^⑥。然而,本应被杀死的锡布固泰·鄂齐尔图却出现在了三大白桦法典,即Ⅲ(1603年)、Ⅷ(1614年)、Ⅺ(普尔列氏认为是1620年,如下所述,笔者认为是1608年制定的)编纂者的名单中^⑦。这一事实也足以证明白桦法典作为历史资料的价值。以下,以写在各个法典篇头文献的编纂年代、编纂者为线索,对当时喀尔喀统治阶层的动向予以考察。

首先,位于巳年法典(Ⅷ)和申年法典(Ⅺ)编纂者首位的“汗殿下”(qaγan aqai)^⑧究竟指的是谁,在对此予以确认的同时,对这两个法典的编纂年代亦予以确认。普尔列氏推断“汗殿下”所指为衮布·土谢图汗,将申年推断为1620年,二者均缺乏确凿的证据^⑨。申年法典(Ⅺ)记录了21位编纂者的姓名。这对于考证人物和年代都是非常有利的。检索编纂者的姓名就会发现,从格埒森札算起,第3代王公的名字较多。排在第2位的是格埒森札的次子诺颜泰·哈坦·巴图尔的儿子哈坦·巴图尔(Qatan bayatur,生于1551年)^⑩,排在第4位的是格埒森札的第6子德勒登·昆都伦的次子岱青·巴图尔(Dayicing bayatur,生于1561年)^⑪,位于第5位的是格埒森札的第3子诺诺和·伟征·诺颜的第4子昆都伦·楚库尔(Köndelen cögökör,生于1561年)^⑫。其次,位于第6至第10位的分别是格埒森札的末子萨穆·贝玛的长子绰尔格勒(Joryol,生于1562年)^⑬、第3子和硕齐(Qosiyüci,生于1573年)^⑭、第5子绰克图(Čoytu,生于1576年)^⑮、第6子忽兰阿拜(Qulang abai,生于1579年)^⑯。紧跟在其后的是上面所提到的诺诺和·伟征·诺颜的第3子伊勒登(Yeldeng,生于1560年)^⑰、第5子和硕齐(Qosiyüci,